

**A Collection
of Chinese
Prose**
Since 1949

新中國
散文典藏



第二卷

The Second
Volume

主編
王景科



山東友誼出版社

新中国 散文典藏

第二卷

主编 王景科

 山东友谊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中国散文典藏.第2卷/王景科主编.--济南:
山东友谊出版社,2015.3

ISBN 978-7-5516-0778-0

I. ①新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47480号

封面图:田忠泉

责任编辑:张亚欣

艺术设计:姜海清

主 管: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集团网站:www.sdpress.com.cn

出版发行:山东友谊出版社

地 址:济南市英雄山路189号 邮政编码:250002

电 话:出版管理部(0531)82098756

市场营销部(0531)82098035(传真)

印 刷: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2015年4月第1版

印 次:2015年4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:640mm×960mm 1/16

插 页:6

印 张:26.5

字 数:300千字

定 价:75.00元

(如印装质量有问题,请与出版社出版管理部联系调换)

中国
词典义

策 划：丁建元

主 编：王景科

编委会：王兆胜 张清华 王光东 王剑冰 王景科 丁建元

姚文瑞 李登建 马瑞芳 谭好哲 刘烨园 杨守森

孙书文 张丽军 王 谦 张亚欣 石耿立

目录

陈学昭

工作着永远是美丽的 /001

傅雷

傅雷家书(一则) /007

翻译经验点滴 /009

萧乾

欧战杂忆 /014

往事三瞥 /033

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 /042

在十字架的阴影下 /062

徐懋庸

母亲 /087

季羡林

二月兰 /094

赋得永久的悔 /100

怀念西府海棠 /107

夹竹桃 /112

牛棚杂忆 /116

清塘荷韵 /122

听雨 /127

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/131

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/136

幽径悲剧 /143

邓拓

可贵的山茶花 /148

孙犁

故园的消失 /155

母亲的记忆 /158

戏的梦 /160

芸斋琐谈(八章) /170

黄鹂 /184

童年漫忆 /188

亡人逸事 /193

文字生涯 /198

杨朔

蓬莱仙境 /204

海市 /212

茶花赋 /221

滇池边上的报春花 /225

泰山极顶 /231

香山红叶 /236

黄苗子

华山谈险 /240

床虱 /249

遗嘱 /253

陈残云

异国乡情 /257

遥寄星岛 /273

莞城之夜 /278

周而复

不屈不淫征气性 /284

浪淘沙 /300

历史的镜子 /311

瑞士秋色 /322

杨沫

白与黑 /331

我与北大 /343

乡思的朝和暮 /348

严文井

给匆忙走路的人 /360

黑色鸟 /363

论友情 /366

我的兄弟们 /370

小草哀歌 /373

一直在玩七巧板的女寿星 /377

碧野

静静的河湾 /381

山高云深处 /388

盐湖之夜 /403

高高的天子山 /411

工作着永远是美丽的

我的一本小说《工作着是美丽的》，早在抗战初期，在延安、晋西北等地的行军途中就开始构思的了。战争年代，流动性大，环境艰苦，我却心中激荡着美丽的感情，坚持写作，一直断断续续地多少年月，终于脱稿并在1949年3月出版了。书中写下了自己对人生的态度和对革命事业的感情。我高兴地捧着它迎接了全中国的解放，我把它当作是祝贺胜利的献礼。

1954年，书又再版了。在当时真真切切的大好形势下，广大的读者纷纷写信，给了我许多的希望和激励。我感到幸福。下决心要为党为革命继续写作下去，写新时代的“工作着是美丽的”。

不料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突然之间，我被打入了“右派”的罗网，成了一个“类”字号的人物，写作也因此难以再进行下去了。二十多年来的遭遇和付出的代价，实在够得上惨重。我这个从延安时代过来的女作家，被定为“右派”之时，年纪刚过五十，如今已是七十

余高龄的老人了。那被勾划掉了的“美丽的”人生，不可追回，太可惜了。

往日的往事，我不愿意多去回忆，可又常常不自禁地一幕幕拉开在面前，赶也赶不走；后来，便索性不再驱赶和回避它了。我想从这里也能汲取到前进的力量——不忘失去的“工作着”的日子，就应当更加珍重和努力获得“工作着”的现在。党的三中全会精神，鼓舞人心，举国上下正在向着四个现代化进军，我虽然年近古稀，也要老骥伏枥，只要一天不倒下阵去，便要日日努力地“工作着”，为“美丽”的“四化”，尽到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。

我在那失去“工作着”条件的时候，特别是“四人帮”棍棒专政的年月，被禁锢得濒于绝生。我想报效于党的事业，不给机会；我想为毕生追求的信仰写点文章，传帮后代，得到的回答尽是粗暴的谩骂和盖顶的凌辱。一次，我被挂牌子拉出去示众，因为天热，我当时只穿了条齐膝的人造丝的裤子，请求扭我两臂的人，放开我，稍等一下，让我去换条长些的裤子，竟不被允许，揪住我就走。他们没有把人当作人看待，人的最起码的尊严完全被践踏净尽了。又有一次，一些人拉着我头发，扬着明闪闪的剪子，要给剪个“阴阳头”，我苦痛已极，大喊大叫：“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没叫你们这样侮辱人啊！”……

在那个时候，活着都困难了，哪里还能谈到什么“工作着”和“美丽的”呢！

仅只是我一个人受难倒也罢了，亲戚朋友和同志也跟着我备受牵连，因为我而遭殃甚至被害绝命，实在是太叫人心痛心碎了。我得在这里说几句话，借此悼念那些个无辜的冤魂，也平一平自己的一颗

滴血痛苦的心。

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徐瑞云同志，出生在一个经济情况不太坏的家庭里，她原籍浙江德清，生长在上海。后来患了肺病，整天抱病在家学习数学，不久病愈，考得官费去德国留学，获得了博士学位。解放后回国任教。1956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按说，徐瑞云同志该是个难得的人才了吧，可是很不幸，因为受到我的株连，她竟被揪斗迫害致死，说来真是令人可叹，我和徐瑞云同志相识，只是在解放初期省人民政府召开人民委员会的时候，因为参加这个会的最初只有三个女同志：徐瑞云，刘天香（妇科专家）和我。开会时常坐在一起，这样就熟识了。仅仅因为这样的关系，打击我就把她也整了一通又一通，直到她死了为止。她死得实在太冤枉了！

还有个广东省卫生局的局长李得奇同志，1926年参加共青团，1938年回到延安，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这位老同志也被说成是和“大右派”陈学昭一条线上的人，被迫害死了。其实，李得奇同志早年是延安的牙科医生，技术高明，服务态度又好，当时延安被封锁，补牙材料奇缺，他千方百计地想出办法，解决了许多困难。那是1944年吧，陕甘宁边区政府，召开劳模大会，我被《解放日报》分配去会上采访，李得奇医师是我采访的对象之一，为他写了一篇报道——被“右派”宣扬过的人，那还了得！——他们把这篇报道找出来，写成大字报，贴在大街上，又加上他曾在印度尼西亚住过（事实上他在国外也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），于是，他便成了“走资派”加“里通外国特务”再加“黑线人物”三料角色，就这么七斗八斗，给活活斗死了。

我的唯一的女儿，只读了二年中学，每到学期终了，课本还是新

的,天天高喊学农、学工、学军,还美其名曰:“手上有老茧,就是大学生了!”接着,就分配她去拉大板车,当了个苦工。应该增长知识的大好青春,生生失掉了!大量的有用的辰光,白白荒废了,而且是无法追回的了。我想到我年轻的时候,十几岁就到法国求学,还担任了天津《大公报》的驻欧特派记者,一边学习,一边工作,每周发回一篇稿子。我那时只知拼命地学习,还感到知识有限,时间不够用的。如今我的女儿呢?不错,一个姑娘,常年重劳动或拉板子车,也是工作,谁能说这不是工作呢!但是,如果她能有文化,有知识,“工作着”不是更好一些吗?

那个时候,不仅人要受难,连书籍也在劫难逃!我有一部《四部丛刊》被抄走了,《康熙字典》成了毒草,至于《红楼梦》《水浒》……以及所有外文书,统统落于灾难了。我为此悲痛已极。如果所有的书籍统统勒令为“封、资、修”的东西,仅仅留下一本小红书——一本小红书真的就能代替了知识的海洋吗?这是人人心里明白的事情。

我的痛苦太深、太重,也太多了。

1965年2月,邓颖超同志请她的女秘书写了封信给我,我夹在书里,忘记烧掉。不料被抄,居然又因此惹下了大祸。他们一手拿着这封信,一手提着鞭子,没日没夜地审讯我,让我交代和周总理、邓大姐的关系。唉!事后我才明白,他们哪里是单单为了找我麻烦,“批宋江”,“抓大儒”——分明是在想方设法陷害我极尊敬的大阿哥——周总理呵!

陈毅将军有首诗说得好:“莫道浮云终蔽日,严冬过尽绽春蕾。”正当我处在冬云蔽日、不胜忧虑的时刻,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即将召

开,通知我为代表。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,人变得麻木了。后来,同志们再三解释和说明,甚至把火车票送到了我的手上,我才真真实实地相信了。我欣喜万分,那心情真像李白得赦时那样:“千里江陵一日还”了!

到了北京,会见了许许多多的老战友、老同志,大家握手相顾,恍若隔世之人。一天晚上,我见到了邓大姐和康克清同志。在住所地方,当时我望见了她们二位,眼睛一亮,顿时觉得周身热融融的,灯光也显得更灿烂了。康克清同志紧紧拥抱了我,后来,我又单独去会见过邓大姐。邓大姐张开两臂一下子就把我紧紧地拥抱住了,她亲切地、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身子,也是在抚摸着我的伤痕斑斑的心啊!邓大姐和康克清同志,一人拉着我的一只手,瞧瞧我的脸,又上上下下打量了我的身体。我们的邓大姐呵,又一次使劲地紧紧地搂住了我,良久,良久,她大声而又郑重地说:“陈学昭同志,你是个刚直不阿的人,你是个坚强不屈的人!”接着,又贴耳低声关切地说:“身体可好吧?我和总理曾多次谈起你,想念你呢!”大姐的大声评价和低声抚慰,我的心中激动不已。听惯了怒斥和谩骂的我,今天听到这么沁人肺腑的语言,真真是耍心花怒放了。我捧着邓大姐的双手,嘴唇颤抖着,只说了一句话:“邓大姐啊!……”

我复诵不出邓大姐和康克清同志给了我多少安慰、鼓励的话,说不清邓大姐又一次单独会见我,给了我些什么样的挚情和神力,我只觉得孟郊的那首《游子吟》,恰是我彼时彼刻的真情实意。

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”我永远也忘不了,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派人派车由重庆护送我到延安的情景,是他领我走上了革

命的路,又是他和邓大姐在艰苦的战争年代、生活条件十分恶劣的情况下,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。我是在党的怀抱里成长的一个赤子,纵然不肖,可我始终没有忘记母亲的恩情,始终有一颗忠贞的寸草心啊!身处逆境的那些年里,尤其是在“四人帮”逞凶为恶、十分阴沉的日子,正是由于有党的信念,我才顽强地度过来的,没有倒下去。近年,《工作着是美丽的》不仅又一次再版,而且我还完成了此书下集的写作,上下两集合为一册出版了;还写了并发表了近二十万字的《想天涯,思海角》的回忆录,这些就是那个时候在没有了“工作着”的条件下,忍受着一切凌辱,不顾环境的恶劣,伏在一张小凳子上写出来的。我是不爱落泪的人,泪已化成了血,笔尖上滴着血写成的书啊!

《工作着是美丽的》这本书,是我奉献给读者的心声。我虽已年迈,身上还有着病痛,但我还要工作,工作,尽我的所能为党为人民做点美丽的工作。

文代会闭幕,我乘车南返的时候,一路上老在品味着、体会着邓小平同志的《祝辞》,想着盛会上的一些情景,想着文艺春天的来之不易。陡然,西湖公园有副对联出现在我的面前:“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,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。”我觉得它不仅是对“西湖天下景”的赞美,也应当是对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的颂歌,让我们为“明明秀秀”而奋发工作吧!

工作着是美丽的!工作着永远是美丽的!

傅

雷

傅雷家书(一则)

1956年10月3日晨

亲爱的孩子,你回来了,又走了;许多新的工作,新的忙碌,新的变化等着你,你是不会感到寂寞的;我们却是静下来,慢慢地回复我们单调的生活,和才过去的欢会与忙乱对比之下,不免一片空虚,——昨儿整整一天若有所失。孩子,你一天天地在进步,在发展:这两年来你对人生和艺术的理解又跨了一大步,我愈来愈爱你了,除了因为你是我们身上的血肉所化出来的而爱你以外,还因为你有如此焕发的才华而爱你:正因为我爱一切的才华,爱一切的艺术品,所以我也把你当作一般的才华(离开骨肉关系),当作一件珍贵的艺术品而爱你。你得千万爱护自己,爱护我们所珍视的艺术品!遇到任何一件出入重大的事,你得想到我们——连你自己在内——对艺术的爱!不是说你应当时时刻刻想到自己了不起,而是说你应当从客观的角度重视自己:你的将来对中国音乐的前途有那么重大的关系,

你每走一步,无形中都对整个民族艺术的发展有影响,所以你更应当战战兢兢,郑重其事!随时随地要准备牺牲目前的感情,为了更大的感情——对艺术对祖国的感情。你用在理解乐曲方面的理智,希望能普遍地应用到一切方面,特别是用在个人的感情方面。我的园丁工作已经做了一大半,还有一大半要你自己来做了。爸爸已经进入人生的秋季,许多地方都要逐渐落在你们年轻人的后面,能够帮你的忙将要越来越减少;一切要靠你自己努力,靠你自己警惕,自己鞭策。你说到技巧要理论与实践结合,但愿你能把这句话用在人生的实践上去;那末你这朵花一定能开得更美,更丰满,更有力,更长久!

谈了一个多月的话,好像只跟你谈了一个开场白。我跟你是永远谈不完的,正如一个人对自己的独白是终生不会完的。你跟我两人的思想和感情,不正是我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吗?清清楚楚的,我跟你的讨论与争辩,常常就是我跟自己的讨论与争辩。父子之间能有这种境界,也是人生莫大的幸福。除了外界的原因没有能使你把假期过得像个假期以外,连我也给你一些小小的不愉快,破坏了你回家前的对家庭的期望。我心中始终对你抱着歉意。但愿你这次给我的教育(就是说从和你相处而反映出我的缺点)能对我今后发生作用,把我自己继续改造。尽管人生那么无情,我们本人还是应当把自己尽量改好,少给人一些痛苦,多给人一些快乐。说来说去,我仍抱着“宁天下人负我,毋我负天下人”的心愿。我相信你也是这样的。

翻译经验点滴

《文艺报》编辑部要我谈谈翻译问题，把我难住了，多少年来多少人要我谈，我都婉辞谢绝，因为有顾虑。谈翻译界现状吧，怕估计形势不足，倒反犯了自高自大的嫌疑；五四年翻译会议前，向领导提过一份意见书，也是奉领导之命写的，曾经引起不少人的情绪，一之为甚，岂可再乎？谈理论吧，浅的大家都知道，不必浪费笔墨；谈得深入一些吧，个个人敝帚自珍，即使展开论战，最后也很容易抬出见仁见智的话，不了了之。而且翻译重在实践，我就一向以眼高手低为苦。文艺理论家不大能兼作诗人或小说家，翻译工作也不例外；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翻译理论，头头是道，非常中肯，译的东西却不高明得很，我常引以为戒。不得已，谈一些点点滴滴的经验吧。

我有个缺点：把什么事看得千难万难，保守思想很重，不必说出版社指定的书，我不敢担承，便是自己喜爱的作品也要踌躇再三。一九三八年译《嘉尔曼》，事先畏缩了很久，一九五四年译《老实人》，足